

“孔子成六经说”考辩

吴天明

(武汉大学 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摘要]孟子至今,学者多称“先王陈迹”杂乱,不堪作学堂教材和治国指南,故孔子删之;或称先贤删之,孔子复删定之;甚至称孔子作之。孔子所删所作,或称某经,或称六经,总之,“孔子成六经”以作弟子教材和治国指南,后世效仿,故六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经典。根据杨伯峻、高亨、卫聚贤三位先生的研究成果可进一步推论,“孔子成六经说”的真正源头不是孟子,而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子夏。孔子死后,子夏传经,多次暗示明示“孔子成某经”,本欲让孔子与六经互相成就,不料孟子等后世学者越说越玄,以致成为一笔糊涂账。从礼制礼法上讲,孔子无权删经,更无权作经,作经删经者皆另有其人,“孔子成六经说”有违礼制礼法。从时代先后上讲,“先王陈迹”早在孔子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即已删修定型;列国之《春秋》由各国历史官长期记录,并反复删修定型为本国官学教材和治国指南,其余五经则由王朝历代官员统一作之并反复删修定型为华夏官学教材和治国指南,故“孔子成六经说”不合历史逻辑。不过孔子虽未“成六经”,但他遵从传统,以六经授徒,徒子徒孙代代传授,这对传承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亦居功至伟。

[关键词]六经;孔子;子夏;孟子;钱玄同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2.10.013

《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1]是中国“古国时代”^[2]以来五千多年最重要的治国经典,又是中华民族全部思想文化的源头和根基所在,是政教文史哲法等学科的理论渊薮和指导思想,而孔子又是六经之学最伟大的总结者,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思想家,他终身学习六经、传授六经,弟子后学世代相传,直到现在,故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自孟子以来就一直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重大问题和基本问题之一,不过却一直是一笔糊涂账。战国至今或直接或间接,或有

意或无意参与讨论的学者很多,古代学者如子夏、孟子、董仲舒、司马迁、郑玄、王充、颜师古、孔颖达等,近现代学者如皮锡瑞、钱玄同、李景春、周予同、杨伯峻、高亨、卫聚贤、刘家和谐等。

由于“孔子成六经说”的时间跨越两千多年,涉及古今学者众多,文献很多,具体观点非常复杂,论证方法亦五花八门,所以学术史上遗存的史料很多。下文将在简单梳理“孔子成六经说”“孔子与六经无关说”的来龙去脉之后,主要从“孔子成六经说”是否符合礼制礼法逻辑和历

作者简介:吴天明,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

史事实逻辑两个方面展开论证,旨在避免堆砌大量史料,陷入繁琐考证,徒增文章篇幅。

一、子夏引起的一笔糊涂账

古来学者研究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大多以《孟子》^[3]“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的说法为源头。但传世文献最早暗示、明示“孔子与六(某)经有关”“孔子成六(某)经”的却并非孟子,而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子夏。孔子去世后,子夏遵照先师遗命传经,遂有意将孔子与六经紧密关联在一起。杨伯峻先生、高亨先生、卫聚贤先生都没有专门系统研究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但他们在研究相关经文和历史事实时,都在客观上帮助我们发现了子夏首倡“孔子成六经说”的秘密。

《春秋·哀公十六年》最后记载:“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这是鲁《春秋》最后的经文,此后十一年《左传》有传无经。很显然,《春秋》这样记录是想告诉我们读者,孔子一死,鲁《春秋》一书就结束了,春秋时代就结束了,^[4]甚至整个六代就结束了,孔子是春秋时代的象征,甚至是六代的象征,鲁国史官这样记录,该有多少感慨!但鲁《春秋》的体例是,天子、王后书崩,鲁侯、夫人书薨,鲁侯本家公卿书卒,如《僖公十六年经》记载“公子季友卒”“公孙兹卒”,二者均为“三桓”。孔子仅仅是一位庶姓国老,^[5]《春秋》本不当记录其卒。那么“夏四月己丑,孔丘卒”这几个字,究竟是鲁国史官的原始记录,还是后人所加呢?如果是鲁史的原始记录,孔子当时在鲁国有这样重要的政治地位吗?如果是后人所加,又是何人所加,何时所加,为何要加呢?杨伯峻先生经过缜密考证,推定这几个字并非鲁《春秋》原始记录,而是《左传》作者所加,但未明示《左传》作者是何人。卫聚贤先生的《古史研究·左传的研究》则认为,《左传》的真正作者就是孔子的弟子子夏。^[6]那么,如果综合两位先生的意见,《春秋》最后的“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几个字,应该就是子夏所加。孔子去世后,子夏继承先师衣钵而治《春秋》,子夏又是《左传》真正的作者,“夏

四月己丑,孔丘卒”正是子夏所加,而并非经文所固有。如果《春秋》为孔子所作,他当然不可能记载自己去世之事。子夏这么做,只是要确定孔子的政治地位和历史地位,并不是要说“孔子作《春秋》”:“鲁史居然记录先师去世,而且先师一死,鲁《春秋》就结束了,春秋时代乃至整个六代也就结束了,先师孔子是一个时代的标杆,是六代最后的一位圣人。”春秋君子无不喜欢给先代圣人排队:尧舜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周公之后呢,子夏以为应该是先师孔子。这些就是子夏此举想告诉子孙的。

子夏并没有止步于此,他甚至明示“孔子作《春秋》”。杨伯峻先生进一步考证,《左传》的作者最早明示孔子著《春秋》,杨先生举了两个案例证明此说:其一,《僖公二十八年传》记载:“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经传均记载,本年晋文公召见周天王,即“以臣召君”。《左传》作者借孔子之口,称《春秋》“天王狩于河阳”六字为孔子所书,而非鲁国史官所书,这就是《左传》作者明示“孔子作《春秋》”的证据。其二,《成公十四年传》:“君子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后世学者公认“君子曰”云云的“君子”就是《左传》作者的自称,案例甚多。杨先生认为“君子”口中的这位圣人就是孔子,那么《左传》作者子夏就是明示“孔子作《春秋》”了。^[7]

孔子是商人子孙,孔子去世后,弟子们居然按照早已废除五百年之久的殷商古礼为他守孝三年,子贡甚至为他守孝六年,^[8]可见弟子们对孔子的道德学问何等感佩!子贡虽因时代的原因,没有继承老师的衣钵,而成为纵横家的祖师爷,但他把孔子比作日月,认为孔子与日月同光;^[9]曾子门徒最终编辑《论语》,使之成为六经的理论总结,并使孔学最终形成,^[10]所以子夏有意将孔子与伟大的六经联系在一起,并非不可理解。

杨先生通过这两个案例,经过缜密考证,认

定“孔丘卒”几个字就是《左传》作者所加。但是杨先生考证,孔子并没有“修”《春秋》,更没有“作”《春秋》,只是拿《春秋》作帐下弟子的教材而已。^[11]不过杨先生没有进一步说明早在孔子之前,列国《春秋》就是各国官学的教材和官场的治国指南之一。

受杨伯峻先生、卫聚贤先生的共同启发,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在鲁《春秋》中加上“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几个字,和在《左传》中两次明示“孔子作《春秋》”的,都是孔子的授业弟子子夏。

孔子的学问晚年才老到,故其早期弟子只做官,不做学问,晚年弟子不仅大多出任公卿大夫,^[12]而且全都设帐授徒,甚至包括愚笨的高柴在内。^[13]子夏是孔子晚年的入室弟子和设帐弟子,自然知道鲁《春秋》是鲁国历代史官所作所修,是鲁国官学的教材之一和官场的治国指南之一,孔子亦遵从政治传统拿来作教材而已。^[14]子夏无比服膺孔子,孔子死后,曾参独传孔子仁学礼学,使孔子治国之道经子思、孟子、董仲舒而不绝如缕,至汉武帝大帝而终于大放光芒;子夏独传《诗》《礼》《易》《春秋》四艺,经孔安国、郑玄而传承至今。史称子夏:“序《诗》,传《易》。又孔子以《春秋》囑商,^[15]又传《礼》。”^[16]他在传述四经的过程中,或出于对先师的崇拜和怀念,或欲假借六经成就孔子,或欲让先师与六经互相成就,或几种想法兼而有之,总之有意在没有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把先师孔子的元素掺入六经,经后人不断发酵,至司马迁终于形成“孔子成六经说”,子夏这样做的动机和可能性都存在。

杨先生、卫先生的上述发现,与高亨先生研究《诗经》时的发现可谓不谋而合。高先生的《诗经今注·前言》甚至直接认定,《左传·哀公十四年》记载了与孔子有关的“获麟”故事,孔子当时还作过一首《获麟歌》,该诗即《诗经·周南·麟之趾》。高先生虽然没有明确指出是谁把孔子的《获麟歌》编入《周南》,但孔子死后子夏传《诗》,经汉唐学者传承至今,把孔子之诗编入《周南》,子夏有这个便利条件,也有这个动机。

杨伯峻先生、卫聚贤先生、高亨先生都无意于系统研究孔子与六经的关系,但又都在研究经文时,实事求是地揭示了孔子与六经的这一关系,而且都在客观上把最近两千多年“孔子成六经说”的源头指向了子夏。三位先生的意见值得我们认真关注。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代初期,只比《论语》成书稍晚,是孟子师徒的必读书之一,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师徒经常引用《左传》所记春秋故事和《左传》所引孔子对春秋人物、事件的评论。不知是否受到《左传》的影响,孟子也笃定认为孔子作了《春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并没有援引子夏的成说,其“孔子作《春秋》说”的唯一证据是孔子关于《春秋》的两句话,不过孟子也就这么一说罢了,恐乃战国辩士之论,那两句话未必真的就是孔子语录。^[17]孟子一直认为自有生人以来,孔子最伟大,孟子次之,他经常引孔子语录、孔子行事以自重,并非完全不能理解。为了论证自己所言不虚,争辩获胜,孟子除了编写“揠苗助长”等寓言故事以外,还编写了“垄断”等社会故事,这是战国辩士的通行做法,中国寓言至战国时代成熟,诸子争辩是重要原因之一。故孟子所引孔子那两句话,未必可信。证据既然并不可信,“孔子作《春秋》”的结论当然也并不可信。

孟子之后,汉初董仲舒亦持“孔子作《春秋》说”,其《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解读《春秋·僖公十六年》“陨石于宋五”的经文道:“圣人之谨于正名如此。”董子所说的这位“圣人”就是指孔子,董子此言,就是明示“孔子作《春秋》”。

董子的弟子司马迁进而系统地提出了“孔子删定六经说”,其《孔子世家》《十二诸侯年表》《太史公自序》最早系统论述了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太史公认为,孔子编《书》,删《诗》,编定或修订了《礼》《乐》,作了《春秋》,并作了《易传》,总

之六经都经过孔子之手作或删编,最后定型。不过后世学者认为,太史公这一说法很可能受到他的老师董仲舒的影响,而董仲舒不仅是学者,还是政治家,董氏要尊孔,推崇孔子治国之学,难免会夸大孔子的功劳,加上太史公只是下了断语,并没有论证,所以近现代学者对太史公此论并不怎么相信。司马迁之后,古代学者大多持“孔子成六经说”。

近代以来的学者对孔子是否“成六经”,则走上了两个极端。清末学者皮锡瑞也提出了“孔子删定六经说”,^[18]其《经学历史》《五经通论》二书认为,孔子之前有许多“先王之迹”,不堪使用,是孔子将这些杂乱无章的原始史料,分别编修为《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乐》无经文)，“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不过皮氏并没有论证孔子何时、如何把“先王之迹”分别删定为六经,更没有说明无数的“先王陈迹”为什么一定要等到孔子来删编,故后世大多数学者,尤其是疑古派学者认为,皮氏此论仅仅是悬想揣测而已,并无任何学术价值。

近代疑古派学者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等文章,根据传世《论语》,逐条分析孔子师徒语录,认为孔子并无任何“删”或“作”六经之事,遂提出了“‘六经’与孔子无关说”。不过钱氏的结论也许是对的,只是他的论证方法却不敢恭维。传世《论语》虽然相当可靠,却并没有收录孔子师徒的全部传世语录,曾子之门徒在编订《论语》时,孔子的长篇大论如《五帝德》《哀公问》之类,仍然任其各自独立成篇,独立成卷,独立传世;^[19]孔子师徒的宗教语录则被全部剔除,以适应乃至引领当时整个国家世俗化的大势。^[20]除了《论语》相当可靠以外,传世《左传》《国语》亦相当可靠,钱氏忽略《论语》以外的所言传世文献,就匆匆忙忙下了结论,这在论证方法上是个不小的缺失,也是钱氏结论不被后人采信的原因。

李景春先生完全认可司马迁关于孔子与六

经关系的判断,但是没有作任何的论证。^[21]周予同先生则认为,孔子以前必有很多“先王陈迹”,先人必然早已做过许多删削工作,由此这些文献可能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删削本;孔子收集整理过这些删削本,以作教材,于是成为儒家经典;孔子整理这些文献有一套自己的标准;等等。^[22]周先生的看法,可以概括为“孔子进一步整理六经以作教材说”,是“孔子删六经说”的调和之论,本质上还是“孔子删六经说”。刘家和先生认为“六经是孔子所治”,这话看似正确,但六经未必就不是孔子前人所治,未必就不是孔子同时代君子所治,因为西周末期春秋时代的经学家已经很多了;刘先生还进一步说,“经学始于孔子”,这就没有任何道理了,无数传世文献早已说明,早在孔子之前就有四经、六经,“经学”怎么可能“始于孔子”呢?^[23]

概括起来说,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前贤有这么几个结论:其一,“孔子作六经以作教材说”,可以简称为“孔子作六经说”。其二,“孔子删(编辑整理)六经以作教材说”,可以简称“孔子删六经说”。这一说法的基本论证思路是:孔子之前“先王陈迹”必定很多,必定不堪使用,孔子不可能一并拿来作教材,所以需要删而编之,“先王陈迹”方可为六经,六经方可为学堂教材和治国指南。或者认为先人已经先行删编,孔子接着继续删编,然后作学堂教材和治国指南。这一说法看似非常合乎情理和古籍整理规律,颇有迷惑性。问题是,“先王陈迹”何以见得一定要“陈”到孔子之时才删编?何以见得一定要孔子来删编?以上两说均可视为“孔子成六经说”。其三,钱玄同“孔子与六经无关说”。此说只是否认“孔子作六经说”和“孔子删六经说”,但并不否认孔子以六经授徒。这一观点其实是对的,但论者仅仅根据传世《论语》便下结论,应该寓目的传世文献大部分没有采用,所以说说服力不强。

有鉴于此,下文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进一步证成钱玄同“孔子与六经无关说”:一是根据礼制礼法,证明孔子完全没有任何可能“成六

经”，“孔子成六经说”违反礼制礼法，不合周礼的逻辑；二是根据周末春秋官学教材的实际情况，证明早在孔子登上历史舞台之前，六经已成，而且早已成为官学教材和治国指南，孔子设帐，只是遵从官学、官场的传统，以六经授徒而已，从而证明“孔子成六经说”亦违反历史事实的逻辑。

二、“孔子成六经说”有违礼制礼法

西周至今世人言必称“礼”“周礼”，含义有二：一指规范所有世人的广义的礼，今称“公序良俗”，包含法律，《汉书·刑法志》称夏有《禹刑》商有《汤刑》周有《九刑》，说明三代治国已经礼制礼法刑法并行；二指特别规范君子治国实践和获利行为之礼，即狭义的“君子之礼”“周礼”。平民百姓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即可，君子除了要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还需要遵守“周礼”，如同今日之领导干部，除了要遵纪守法，遵守“公序良俗”，还需要遵守“党内法规”，可见狭义的“君子之礼”“周礼”要远远高于、严于广义的“礼”。《礼记》所谓“礼不下庶人”之“礼”，即特指“君子之礼”，非指“公序良俗”和刑法，平民百姓犯罪当然是要受到刑罚处罚的，违反“公序良俗”至少也要受到世人的谴责。世人称“君子之礼”为“周礼”，很可能源自周初周公所作之《周礼》，^[24]而周公之《周礼》当然不可能也毫无必要凭空造作，只可能是对五帝夏商君子治国实践和获利行为的总结和进一步规范。《周礼》虽然无比复杂，但核心意思非常有限，就是周公讲的“功以食民”，即根据其治国富民的功劳大小，确定君子的俸禄；就是后世孔子力图恢复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子的治国实践和获利行为均不可僭越礼制，否则后果非常严重。

按照“君子之礼”的上述基本精神，孔子完全没有任何理由、任何可能“成六经”。孔子虽然是商汤之后，微子子孙，但是家道中落已久，其父叔梁纥只是鲁国的一位庶姓乡邑大夫，是最低级的贵族官员，孔子又是其父的一个庶次子，地位非常卑微，比平民百姓高不了多少。孔子年轻

时为了生存，不得不多做“鄙事”，说明孔子读书只读了孔氏家学，连鲁侯乡学都没有资格上，更不要说上王王国学了。因为周朝的惯例是，乡学、国学毕业即可做官食禄，如果孔子读了乡学，就毫无必要去做“鄙事”。孔子长期自学有成，遂于鲁昭公二十四年^[25]开始设帐，鲁定公十年开始担任鲁国公卿，先后担任过相（外交部长兼礼宾司长）、司寇（司法部长）、中都宰（第二大城市市长），他担任的任何一个职务，都无权“作”任何一经，“删”任何一经。按照礼制礼法，作经删经，都是诸侯、天子的史官、乐官、卜官们的职责，这在周朝只是君子的常识。

孔子不可能成《诗》。传世《诗经》是周初至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年间天下的诗歌选本，毫无疑问只是周王朝和华夏方国诗歌的一个删编本。其一，《诗经》中的作品艺术水平都很高，堪称中国诗歌的永久典范。但是诗人不可能在五帝夏商时代还只会“嘿哟嘿哟”，周代就突然创作这么高水平的诗歌。五帝夏商的诗歌，古人必然也曾长期反复采集，反复删编，但这些“先王陈迹”很可能在周初就被周天子的乐官全部删掉了，以致后世全部失传。^[26]其二，即使是周初至春秋中期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吴楚西戎等蛮夷戎狄之国不可能无诗。从《礼记·明堂位》的记录来看，周初周公摄政时，蛮夷戎狄均已被纳入周王朝的版图，均对周朝称臣，想必在西周时代，周王朝的乐官还会通过列国的乐官收集删编蛮夷戎狄诸国的诗歌。西周灭亡，天子丧失了华夏共主的地位，就连《王风》也被视作列国之诗，蛮夷戎狄遂自外于华夏，恢复丛林本色，周天子乐官遂剔除采集删编的蛮夷戎狄列国之诗歌。其三，周家五百年王朝和华夏列国的诗歌，各国官员也必然反复采集、反复整理、反复筛选，再交给周天子乐官反复整理、反复筛选，并按天子之命最终定型。^[27]五百年间不可能只创作三百多首诗歌。以上这几个基本意思，根本不需要引经据典，繁琐论证，即可自行成立。其四，过去有学者论定传世《诗经》成书于齐桓公时代，笔者受《左

传·襄公二十九年》启发,初步考察春秋时代两百多年《诗》的外延的变化规律,有《春秋〈诗〉义三变》,认定传世《诗经》不可能成书于齐桓公时代,因为那时绝大部分作品,包括《国风》《商颂》《鲁颂》都还没有完全创作出来,^[28]传世《诗经》只可能成书于春秋时代晚期,大约在鲁襄公时代或稍早。传世春秋文献^[29]经常发现有《诗经》佚文,这与《诗经》定型较晚有关。不过《诗经》定型再晚,也比孔子生活的时代要早得多。《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的十世祖正考父,曾将十二首著名的《商颂》拿去请天子乐官最终校订音律,^[30]传世《商颂》仅存五首,那么另外七首当因不合雅言音律而被周天子乐官最后删掉了。由此我们知道,列国均反复采集、反复删编本国之诗,最终由周天子乐官定型。传世《诗经》定型时,孔子刚生不久甚至尚未出生,孔子怎么可能“删《诗》”,怎么可能“作《诗》”呢?而且按照周礼,只有列国诸侯的乐官才能删编本国之诗,只有周天子的乐官才能最终定型天下之《诗》,列国诸侯的乐官尚且无权最终删《诗》,何况孔子?

孔子不可能成《书》。远古把口耳相传的先人故事都叫“书”,包括单个故事和成卷成篇成串的故事,后世“说书”就保存了这一古意。说书人原本都没有文本,只有一个腹稿,至今仍然如此,在没有文字或者文字不成熟、书写不方便的时代越发如此。文字成熟、书写方便以后,远古把单篇成文史和编辑为典册的成文史都叫“书”,传世《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各有几篇,例如《虞书》传世五篇,不可能一次性都记录,必然是一篇一篇地记录,那么每一篇都是“书”,后来组装为《虞书》。其他三《书》成书也当如此,周末春秋将虞夏商周四代史书笼统称《书》,故《左传》引用春秋君子的原话,时而称“《书》曰”云云,时而称“《某书》曰”云云。汉初学者才把四《书》组装成更大更厚的典册《尚书》。

古国五帝时代的先人讲述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故事,不可能要么不讲,要么一并把五帝时代的故事全部讲完,这是逻辑常识,无需论证。

尧舜做大祭司大酋长时,在庙堂朝堂礼堂兼学堂^[31]上,利用朝会、祭祀、行礼的机会,训导下级祭司酋长,不太可能讲自己管理天下的故事,那有自吹自擂之嫌,而更可能会讲黄帝颛顼帝喾等先代圣贤的故事,那么他们禅让时,均叮嘱受禅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32]这就一定是总结了黄帝颛顼帝喾等先人的治国经验和获利行为。这就是说,古国时代的《书》,一定有本记录所有古帝历史的《书》,不可能只有记录尧舜二帝历史的《书》即传世的《虞书》。黄帝颛顼帝喾三帝的《书》,在口耳相传的时代,应该与尧舜二帝的《书》一样,口耳相传,代代相传,后来为什么失传了呢?太史公《五帝本纪》无意之中透漏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三帝故事均“不雅训”。例如《五帝本纪》记载,黄帝二十五子,得了十二姓,这就“不雅训”;^[33]炎黄争霸天下时,动辄出动天神,夏商两代君子怎么看还难有定论,至少周人会觉得这也“不雅训”。既然黄帝颛顼帝喾的故事都“不雅训”,可能早在口耳相传至周初时,前三帝故事就很少有人继续传说了;也可能在西周末期春秋初期,将古国五帝故事记录为成文史时,^[34]没有将其记录为成文史;还有可能将前三帝故事也记录为成文史了,但是周王朝史官、列国史官在反复筛选,最终组装《书》时,将前三帝的成文史给剔除了,所以只剩下虞夏商周四《书》。这三种可能性都不能完全排除,其中任何一种可能性都与孔子完全无关。孔子出生太晚了,出生之前《书》就定型了,而且从礼制礼法上讲,只有天王的史官才有可能参与“删《书》”,孔子一生连诸侯的史官都从来没有做过,更不要说做天子的史官了,他完全不可能“删《书》”“编《书》”,完全没有这个权力。他除了接受传世之《书》,即终生学习、传授四《书》以外,对《书》的经文,他其实什么都做不了。

这里只有两个疑问需要稍加说明。其一,《书》在被史官记录之前,列国自然都会有不同的口传本;在被史官记录为成文史之后,列国自然都会有不同的记录文本;在被周天子史官删编

定型之后,王国和列国又都会有不同的传写本。这必然会导致传世文本《书》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不过都是大同小异而已。中国远古至今未变的文化传统是,天下历史由天子史官奉天子之命确定,一国或郡县历史则由诸侯或郡县长官自行确定,所以传世文本之《书》,包括《左传》《国语》等引用的零零星星的四《书》片段,都大同小异。笔者曾经断断续续花了几十年的功夫,把战国以前^[35]所有传世文献中,涉及《书》的每一个字都找出来,一一琢磨,最后就是这个结论。

其二,近现代学者常推测,孔子设帐授徒,需要传授《书》,而“先王陈迹”太多太杂乱,孔子应该“删”之并使之成《书》。加上汉初孔子旧宅的确发现了虞夏商周四《书》,近现代学者的这一推测似乎合情合理。但是上文已经讲过,按照远古至今的中国礼制,非天子史官不可能“作”“删”天下之《书》,非诸侯郡县史官不可能“作”“删”本国郡县之《书》。孔子旧宅所藏虞夏商周四《书》,只是春秋末期或稍早,鲁国的一个普普通通的传写本而已,并不是孔子“作”“删”的《书》。孔子大约在鲁襄公末期、鲁昭公早期接受孔氏家学的蒙学教育,所读之《书》就是周天子史官已经定型,鲁国学者抄录的四《书》。孔子设帐后,按照周礼,他无权“删《书》”,也毫无必要“删《书》”,孔子终生学习传授的《书》,都是古人早就删定好了的。不能因为“先王陈迹”太多太杂乱,就认定孔子一定会“删《书》”,二者之间不仅没有必然联系,而且关于孔子“删《书》”的这一推测明显违反了远古至今关于天子定天下之史、诸侯定一国之史的礼制礼法。

孔子不可能成《礼》《乐》。礼乐不可分,故下文并论孔子作或删礼乐否。

“礼”有习惯礼法和成文礼法,习惯礼法自然大大早于成文礼法,而且在成文礼法形成之后,还会不断出现新的大量的习惯礼法。即使有了成文礼法,也不可能、没必要,把所有习惯礼法全部成文化。即使如此发达的今天,习惯礼法仍然是最多最主要的,法律上概称“公序良俗”。

根据《左传·文公十八年》的记载,中国最早的成文礼法,是周公亲自著作的《周礼》,^[36]这个“周”有周家天下,包括王朝和方国的意思,还有周备的意思,就是说,周代君子治国富民,同时获取私利的所有制度性规定,周公《周礼》都有了,大家按照这个治理国家就可以了。周公《周礼》当然是对五帝夏商治国实践和理论的总结,不可能也毫无必要向壁虚构。西周时代礼乐征伐均出自天子,《周礼》应该得到了较好的遵守。不过春秋时代就出了大问题,故齐桓公称霸时,主持葵丘之会,与诸侯盟誓,誓约一共有五条,都是要恢复西周礼制礼法即周公《周礼》。^[37]但是时代毕竟变了,天子不再是华夏共主,春秋霸主先后登场,霸主都规定,小国诸侯必须像朝觐天子一样朝觐霸主,必须像给天子进贡那样给霸主进贡,于是即使是最守《周礼》的鲁《春秋》,都认为这些春秋时代的新礼是符合周礼的,《左传》在解读鲁《春秋》时,凡是视霸主为天子者,《左传》均称“礼也”,反之均称“非礼也”。孔子倒是很想完全恢复周公《周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让礼乐征伐都出自天子,可是从孔子在世一直到汉武帝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卿大夫、诸侯、天子听孔子的。孔子既无权“删《礼》”,即使“删”了也没有人听,更不可能把自己删了的《礼》拿去作教材,因为孔子的弟子都是要到列国去做官治国的,你用一本只有自己认可的《礼》去培养官员,弟子怎么可能做官治国呢?

《乐》,周代文献亦称《周乐》,指在周家天王、诸侯、卿大夫的庙堂、朝堂^[38]、礼堂、学堂上正式演唱演奏舞蹈的五帝三代音乐作品,包括黄帝之《云门》《大卷》,尧之《大咸》,舜之《大韶》,汤之《大濩》,周武王之《大武》,等等,^[39]这些作品都类似唐朝的《秦王破阵舞》和新中国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春秋晚期之《周乐》则包括《诗》,^[40]说明时代不同,具体音乐作品亦不同。《周乐》是天子、诸侯、卿大夫的庙堂、朝堂上使用的作品,孔子从未担任乐官,有什么权力去“删《乐》”呢?即使他私下“删”了,有谁听他

的呢?孔子当学生,后来做老师,学习传授的就是春秋晚期官方确定的《周乐》,而且最终的确定者必然是周天子的太师,连诸侯的乐官都没有这个权力,何况孔子?

孔子不可能成《易》。远古卜筮之书均称“易”,《周礼·春官·宗伯》称,有伏羲时代的《连山易》、黄帝时代的《归藏易》和周代《周易》,古人因此简称“三《易》”,《周易》自然时代最晚。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僖公十五年》称,夏商两代也皆有卜筮之书,而且本年秦国卜官卜徒父的卜筮,未必一定是用《周易》占卜。杨先生所言极是。从人类文明发展史上讲,每一代,每一个种群,都可能有一自己的一套卜筮办法。《周易》相传为周文王所作,周代极力推崇《周易》,当有统一天下思想文化、治国方略之意。古人解释《周易》之“周”,有周代和周普两种意思,周代当然大大晚于伏羲、黄帝时代,周普则可能暗示《周易》吸取了《连山易》《归藏易》等许多先代之《易》的长处,达到无所不备的地步。“三易”无疑都是“先王陈迹”,但是《连山易》《归藏易》等先王之《易》却都失传了,如果不是周初若干代卜官按照周天子旨意刻意“删”掉《连山易》和《归藏易》这些“先王陈迹”,刻意要求王国和所有方国的卜官都使用《周易》,这一现象就很难得到科学解释。当然,在周代卜官删掉《连山易》《归藏易》时,孔子远未出生。

《周易》的经文包括卦画符号和解释这些符号的文字。后人释经的十篇文章,可做经文的辅翼,故战国末期学者称《十翼》;可帮助解读经文,故汉初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称《易大传》,班固《汉书·儒林传》称《传》,后人称《易传》。经文的“作”“删”自然都跟孔子没有任何关系。至于《易传》,《史记·孔子世家》《汉书·艺文志》认为是孔子所作;《论衡·正说》认为孔子只作了《易传》的一部分;宋儒赵汝谈、清儒崔述、近代学者钱玄同、顾颉刚,当代学者冯天瑜先生则都证明,孔子与《易传》无关,《易传》是很多代学者解读经文的杂凑的书。^[41]

孔子不可能成《春秋》。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前言》详细考证了《春秋》与孔子的关系,他不仅完全否认《左传》作者和孟子的“孔子作《春秋》说”,认为孔子不仅没有“作《春秋》”,甚至没有“修”即“删编”《春秋》,只是用鲁《春秋》作自己弟子的教材而已。杨先生还认为,《春秋》记载“孔丘生”“孔丘卒”,当非鲁《春秋》原文,而是后世传《春秋》者所加,“藉以表示《春秋》和孔子的关系罢了”。杨先生论证缜密,结论可靠,其书传布甚多,读者自可查阅。

上文主要根据礼制礼法简要分析,孔子不可能“成六经”,他不可能有这个政治权力,没有这个“成经”资格,不可能僭越礼制去“成六经”。作六经、删六经,都是历代天王、诸侯的历代史官、乐官、卜官们的事情。

三、“孔子成六经说”不合历史逻辑

本节重点谈谈周末春秋时代国学^[42]教材的情况,以证明六经成且为国学教材和治国指南之后,孔子才登上历史舞台。

当下学者们大多喜欢利用搜索引擎,根据“国学”一语最早出现于战国末期的私人著作《周礼》,^[43]而断定国学产生的时代,这种研究方法并不可取。其实不管有无国学之名,只要社会有了比较可观的剩余财富,就会扰乱祭司酋长的心智,部分祭司酋长就会占有这些剩余财富,就会产生私有制,并会形成国家,社会的利益冲突就会非常激烈,国家治理就会非常艰难,就会产生国学学堂^[44]和国学学问。这是由经济发展规律决定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与“国学”一语是否出现于传世典籍没有必然联系。笔者曾经仔细考证大汉以前的国学教材,情况大约如下:古国五帝新石器时代的国学教材为口耳相传的《礼》《乐》《书》;夏商周青铜器石器混用时代的国学教材为口耳相传和部分文本的《礼》《乐》《书》;周末春秋战国铁器时代,为文本化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其中周末至鲁

襄公时代为前四经,昭公定公哀公时代新增《易》《春秋》为六经。至于大汉至今的国学教材,《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等史书均有详细记录,当今“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所有图书馆目录均有记载。

《公羊传》《谷梁传》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45]《孔子世家》称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二年,差别不大,学者没有必要为此争来争去。按此推算,孔子应该在鲁襄公时代末期、鲁昭公时代初期接受孔氏家学的启蒙教育,所学很可能还是前四经,没有《易》《春秋》,所以孔子要“五十以学《易》”。他出身卑微,不可能上鲁国乡学、王朝国学。^[46]他于鲁昭公二十四年设帐,鲁哀公十六年去世,一生设帐将近四十年。其间鲁定公十年担任鲁国公卿,大约三年后被迫辞职,然后带着部分弟子周游列国,直到去世。我们可以将孔子一生的概况,与六经作官学教材和治国指南的概况作个非常简单的对比,就会发现,“六经成”且成为学堂教材和治国指南后,孔子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因此“孔子成六经说”不合历史逻辑。

孔子曰:“入其国^[47],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48]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絜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

孔子说只要进入人家的国都,观察其君子,便知其六艺之教如何,想必这与孔子晚年周游列国的经历感受有关。孔子一生主要在东夏列国齐鲁宋卫活动,孔子这番话说明,当时至少东夏列国的家学和乡学都在开设《诗》《书》《礼》

《乐》《易》《春秋》六艺的课程,以培养未来的官员;列国官场都在以六艺为行政指南和评价国家治理得失的标准。以孔子在世时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声望,不可能列国受孔子设帐的影响而开设六艺课程,只可能是孔子设帐遵从官学、官场传统,开设六艺课程。不能因为大汉至今孔子声望高,就倒果为因。

华夏列国的六艺,可能既有统一教材,也有地方乡土教材,乡土教材就是各自的《春秋》。

华夏列国的统一教材应包括《诗》《书》《礼》《乐》《易》五种。《诗》为周天王乐官最后编订,代表了华夏共主的政治意志和华夏列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主流思想文化;^[49]《书》即《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汉人合编为《尚书》,这是华夏列国公认的最古老的成文史;^[50]《礼》当即《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的周公亲自著作的《周礼》,是华夏列国君子最高的治国指南和行为规范;^[51]《乐》当《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的最后定型的《周乐》^[52],《周乐》自然要通行周天王治理的华夏列国;《易》也称《周易》,“周”是“华夏”的同义语,那么《周易》也当通行华夏列国。

但是《春秋》却没有通行本。《墨子·明鬼》虽然记载有“周之《春秋》”,但将此书与列国《春秋》相提并论,估计“周之《春秋》”并没有取得《诗》《书》《礼》《乐》《易》那样的政治地位,^[53]所以华夏列国自当各用本国之《春秋》作官学的“乡土教材”“校本教材”,而不太可能采用某国的《春秋》作天下的通用教材。《国语·晋语七》记载,晋国大夫向晋悼公推荐深谙德义的贤士羊舌肸,因为“羊舌肸习于《春秋》”。羊舌肸所习的《春秋》自然不可能是他国的《春秋》,而只可能是晋国的《春秋》。

华夏之外,蛮夷戎狄之国亦有开设官学者,其教材如何,可以通过传世文献略知一二。

(楚庄王就如何教育太子之事,)问于申叔时,叔时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

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国语·楚语上》)

楚国太子需要学习《诗》《礼》,这两门课程的教材应该与华夏列国相同;其《春秋》应该指楚《春秋》,煌煌楚国的太子,没有学习别国《春秋》的道理;其《世》自然是楚国先王的世系,其《乐》恐怕也不是《周乐》,而是楚国音乐,即当时华夏列国所谓的“南音”;^[54]其《令》应该是楚国先王的政令;《语》可能是楚国先王的治国语录;《故志》亦当为楚国史书,其与楚《春秋》如何分工,文献阙如,不得而知;《训典》,学者或谓“五帝之书”,^[55]从书名推测,也可能是楚国先王训诫子孙之专门语录集。申叔时所开列的这些书目,应该包括但不限于楚国家学、乡学的课程和教材,因为楚国太子所读的书,至少要与家学、乡学的学生相当。由于太子将来要做楚王,所以可能需要比一般学生多读一些书。从申叔时所开的书目里,我们看到,既有与华夏列国相同的书,更多有楚国自己的书,这与楚国当时华夏化的水平不高的基本历史是相吻合的。

秦汉时代,天下主要有两大集团,一个是北方华夏集团,一个是以楚人为代表的南方蛮夷集团。汉高祖称帝,萧何负责修建未央宫,特意只修两个大门,一个是北门,一个是东门。华夏以北为至尊,西为次尊;东夷以东为至尊,南为次尊。萧何此举,显然是为了调和华夏与东夷的礼制。^[56]经大汉四百年的进一步融合,华夏与蛮夷终于融合为汉族。这些史料可以反证,在春秋楚庄王时代,楚国的家学、乡学,使用了一部分华夏通用教材,但更多地使用了一部分楚国自己的乡土教材,应该符合历史事实。

简而言之,当孔子还没有真正登上历史舞台时,六经已成,而且成为华夏列国的官学教材和治国指南,所以“孔子成六经说”不仅不符合礼

制礼法,也不符合历史逻辑。

上文已经论证,按照周礼,华夏列国的《春秋》由各国历代史官自作自删,其余五经由天子历代史官、乐官、卜官等自作自删,孔子没有任何权力作删六经,“孔子成六经说”违反了礼制礼法。早在孔子之前,六经就是王国和华夏各方国官学的教材和官员的治国指南,孔子终身自学六经,设帐用六经授徒,只是遵从华夏列国官学、官场的传统而已,并非首创,“孔子成六经说”违反了历史逻辑。汉朝至今,许多学者坚信“孔子成六经说”,一个重要原因是,伟大的孟子、董子、司马迁均持此论。近代疑古派学者钱玄同否认“孔子成六经说”,观点虽然正确,但因论证很不严谨充分,后世学者遂多予否认。“孔子成六经说”的首倡者不是孟子,而是孔子的帐下弟子子夏。子夏这么做,旨在让先师孔子与六经互相成就,这说明战国时代初期,辩士之风已经开始形成。

孔子虽然没有“成六经”,但是孔子开创了按照华夏列国官学、官场的传统,以六经传授私学弟子的新传统,这一新传统又被其战国时代的徒子徒孙代代传承,至大汉进一步发扬光大,成为后世官学、官场、私学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至清末。所以虽然“孔子未成六经”,但对六经的传承仍然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中国因为有了孔子,五千年思想文化才得到更好的传承,尧舜周公孔子的治国之道才得以影响至今,我们不能因为“孔子未成六经”而否认孔子对传承六经的伟大贡献。

注释:

[1]《乐》无经文,故六经亦可称五经。前贤即经常六经、五经混称。经亦称艺。经之本意,指以绳穿简牍,使成典册,君子朝夕诵读,借以治国理政,造福苍生,遂引申为治国之要籍,不二之法门。经之形式为史书,故顾炎武称“六经皆史”;经之核心作用为治国富民,故先人称“经”。诸子之书亦有治国作用,但其地位作用均远逊于六经,故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指出战国六家皆治国之学,班固《汉书·艺文志》将诸子十家列为第二等,仅次于汉代“新六艺”,《隋书·经籍志》《四库全书》亦然。今日中国之图书馆,无论采取武汉大学图书分类法,还是采取人民大学的图书分类法,均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列为

第一等书即治国之经典,与古人图书分类基本原则相同。但近百年中国学者研究六经,大多深受西学分科影响,无不突出各自学科之特点,而忽略“经”之治国主旨,如解读《诗经》者仅仅视之为“诗”,解读《尚书》者仅仅视之为“史”,以此类推,此举均有违先人治国富民的本意,忽略经学的本色,对学术研究未必有利。

[2]近百年中国考古学家均称,距今5500年—4500年的时代为“古国时代”,约当历史学家所谓“五帝时代”。考古学家目前正在河南继续挖掘5300多年前黄帝时代晚期的“黄帝古城”。古国时代即有辉煌的城市和大型的聚落,并已进入财产家族家庭私有的父系社会,尧舜即流放贪占他人财富的“四凶”(《左传·文公十八年》)。所有证据均证明,古国时代并非孔子至今历史学家所谓“天下为公”的“原始共产主义时代”,而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特殊历史发展阶段,那么就会出现“古国”,就有个国家治理的问题。孔子至今,学者均称大禹之前为“原始共产主义时代”,政教文史哲学等学科均围绕这一基本判断创造了许多理论,现在看来恐怕全都需要重新审视。

[3]由于《孟子》一书所收语录全部都是孟子语录,本文行文时,有时《孟子》、孟子不分。

[4]今之历史学家多以“三家分晋”为春秋时代结束的标志。笔者的学习心得是,孔子治国之学是尧舜夏商周春秋六代最后的经学,又是战国至今最早的子学,孔子去世即表示经学时代结束,子学时代开始,以孔子之死为经学与子学划分的标志,在思想史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5]鲁国为周家之国,姬姓,孔子为殷人子孙,子姓,故孔子在鲁国为庶姓。孔子做鲁国公卿,是“三桓”支持的结果,而“三桓”支持孔子,与“陪臣执国命”,阳虎实际控制鲁国时,孔子拒绝与阳虎合作,无意之中赢得了“三桓”的信任有莫大的关系。当“三桓”发现孔子要强化公室,削弱私家时,就用计谋迫使孔子辞职,孔子遂为国老。可参阅《左传·哀公三年》季康子父子的对话。总之孔子在鲁国的政治地位并不高,远不足以让鲁国史官破例记录他去世之事。

[6]《左传》引用孔子师徒(主要是孔子)评价春秋人物、事件的语录有38处之多,说明作者相当熟悉孔子,十分服膺孔子的道德学问,平日对孔子语录多有记录以备记诵,作者非孔子徒弟徒孙莫属。这一事实似可佐证卫聚贤先生的“子夏作《左传》说”。学者亦有推测《左传》作者为吴起者。吴起是曾子弟子,孔子徒孙,战国初随子夏在魏国做官,亦有假借六经夸饰孔子的动机和便利条件。需要说明的是,按照礼制礼法,子夏、吴起均不能作、修鲁史。按照中国的文化传统,非王朝史官无权作天下史、删天下史;非鲁国史官无权作鲁史、删鲁史,以此类推。今之学者无不认为《春秋三传》为史书,古人则认为《三传》只是鲁《春秋》的传文而已,算不上史书,故子夏作《左传》并不违反古今一以贯之的官修史书的礼制礼法。

[7]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前言·春秋和孔丘》,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7—18页。

[8]详见《史记·孔子世家》。

[9]详见《论语·子张篇》。

[10]孔学是孔子师徒祖孙三代人的共同创造,而不是孔子一个人的创造,详见吴天明:《论语孔学关系考论》,《中州学刊》2021年第5期。

[11]中国有史以来都是官方作史,从来没有允许民间作史的传统,子夏不可能不知道。

[12]只有颜回、原宪、闵子骞坚决不肯做官,其余或迟或早都做了卿大夫。

[13]详见吴天明:《孔子弟子称“子”现象研究》,《湖北社会科学》2018年第12期。该文没有注意到高柴等亦设帐授徒,应予补正。

[14]孔子对官学教育方式的唯一改革,很可能只是不教弟子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知识,大量传世文献没有孔子教弟子小学知识的任何一个案例,故作此推测。王朝国学学制较长,而孔子学堂只需三年(孔子称“三年学,不至于谷,不易得也”),即可能与孔子不教小学知识有关。孔子不教小学知识,可能与他自己只读了家学,没有受到小学知识的严格训练有关,也可能与他认为小学知识并不重要,大学之道即治国之道才至关重要有关。

[15]子夏姓卜氏,名商,字子夏。

[16]《史记·仲尼弟子列传》《索隐》。

[17]《孟子·滕文公下》6·9。中国传统,天下史书由天子史官按照天子授权记录;一国史书则由一国史官按照诸侯授权记录。无天子授权著天下史书,无诸侯授权著一国史书,都是死罪。孔子从未做过史官,既然孟子说“孔子作《春秋》”,按照周礼,孔子就僭越了礼制礼法,犯了死罪。周代有王国方国互通重要情况的制度,被通报者均需记录情况通报,故列国之《春秋》既是国别编年体史书,又是某种意义上的天下通史。鲁《春秋》不是天子之事,只是鲁侯之事,孟子此论亦不确。

[18]周子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该文将皮氏说概括为“‘五经’皆孔子所作说”,此非皮氏“删定说”之本意。

[19]孔子的长篇大论最短者近千字,最长者大约3500字,故可无需编辑,自然成卷成篇,无需收入《论语》,自可独立传世。

[20]详见吴天明:《〈论语〉孔学关系考论》,《中州学刊》2021年第5期。

[21]李景春:《孔子与〈六经〉的关系》,《文史哲》1962年第5期。

[22]详见周子同:《“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1期。

[23]详见刘家和:《经学献辞》,《国际儒学(中英文)》2021年第1期。

[24]详见《左传·文公十八年》所引周公《周礼》。周公《周礼》可能在战国时代早中期亡佚,传世《周礼》为战国晚期间学者所作,非官方文件。

[25]《史记·孔子世家》误作昭公七年。详见吴天明《论语记录的六个节点》,《理论月刊》2021年第9期。

[26]五帝夏商子孙,周代均各有封为列侯者,其祖先之诗歌

必然代代相传。只有周天子才能将其全部删掉,令其只能传颂周家王朝和华夏方国的诗歌。余《春秋〈诗〉义三变》考证,直至春秋初期之《诗》,尚仅仅指“二雅”“二南”,皆为周诗,西周应当越发如此。这一史实可为“周初删五帝夏商诗歌说”提供佐证。

[27]宋国许多代的乐官,按照历代宋侯之命,反复采集、删编《商颂》为十二首,孔子十世祖正考父将十二首《商颂》带到周王朝,请周天子乐官校正音律,又被删掉了七首,最后定型为五首的《商颂》,遂传世至今。详见《国语·鲁语下》。

[28]例如《鲁颂》创作于鲁僖公时代,而齐桓公死于鲁僖公十七年。案例甚多。

[29]包括成书于战国,但是原始史料是春秋史料的文献。

[30]《礼记·明堂位》记载,周初即已开始推广普通话“雅言”,《论语》记载孔子在诵《诗》《书》行礼时均用“雅言”,《左传》记载,当楚国人用浓重的楚国方言说话时,史官就会记录楚人用“楚言”说话。周朝包括蛮夷戎狄在内的君子绝大部分都会听、说普通话“雅言”。

[31]据《礼记·明堂位》,周公明堂尚且是一个具有许多功能的草棚子,由此可以推知五帝夏商时代的庙堂、朝堂、礼堂、学堂必然都是一个草棚子:祭祖是庙堂,朝会是朝堂,行礼(成人礼、养老礼、文射礼)是礼堂,教育现任官员和候任官员(弟子)是学堂。据《孟子》,周公明堂至少被奸生保护至齐宣王时代。

[32]孔子弟子摘录春秋晚期鲁国传写本之《虞书》,见《论语·尧曰篇》。

[33]民族学与人类学史料可以证明,父系社会初期男子出嫁,女子娶夫。黄帝二十五子出嫁十二氏族女子,故孙子得十二姓。十二姓孙子再嫁给黄帝的外孙女,故称“归孙子”。这一段历史,夏商周秦汉君子就已经都不能理解了。周代文献常说君子重孙不重子,但是周人只知道这么做,已经不知道原因何在。今日学者均解释为“隔代亲”,也不知道真正的原因。

[34]战国诸子及《战国策》引《书》常作辩士之论,不可深信,故不取。《左传》《国语》采用史料较早,不应视作战国史料。

[35]战国诸子常有辩士之论,为了务求获胜,常有造作者,故其所引古《书》往往难以凭。

[36]所谓礼制礼法一般不包括刑法,所以夏《禹刑》商《汤刑》周《九刑》都只是刑法,而不是礼制礼法,那么周公《周礼》就是最早的成文礼制礼法了。

[37]详见《孟子·告子下》12·7。

[38]卿大夫也有家庙、家朝。周礼规定,天子八佾,诸侯六佾,卿大夫四佾。故一并论之。

[39]详见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庄公十二年》,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191-192页;《周礼注疏·春官宗伯·大司乐》,《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第878页。

[40]详见《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吴公子季札访问鲁国欣赏《周乐》的记载。

[41]详见冯天瑜:《中华元典精神》,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73-81页。

[42]国学:本文亦称官学,问题极其复杂,笔者有长篇论文

《何谓国学》,《学术论坛》2023年第2期待发,恕不重复。

[43]此乃战国私人著作《周礼》,非周公《周礼》,后者失传,仅存十六个字,见《左传·文公十八年》。

[44]最早的国学学堂,与祭祖的庙堂、朝会的朝堂、养老的礼堂、文射礼的礼堂,都是同一个草堂,直到周初仍然如此,周公“明堂”就是这样的草堂。《论语·尧曰篇》摘录春秋鲁国抄录本《虞书》记载,尧舜禅让时,均叮嘱受禅者“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这就是国学教学活动侧影和教学内容,就是对黄帝颛顼帝喾等先代圣王治国实践的高度总结,就是国学理论。后世周公、孔子等无数国家家似乎无比复杂的国学理论,都源于这八个字。

[45]孔子只是鲁国庶姓下大夫的庶次子,与平民相差无几,《公羊传》《谷梁传》都没有记录孔子出生的任何道理。二传如此记录,亦受子夏、孟子、董子影响。

[46]《论语·子张篇》记载卫国公孙朝讽刺孔子没有名师指点,孔子年轻时为了生存多做“鄙事”,而乡学毕业可做大臣家臣,国学毕业可做王臣大臣。这些证据都证明,孔子只读了家学,相当于小学毕业。

[47]国:周代文献,国有二义,一指国都及其郊区(“国人”之义即由此而生),二指全国。此用第一义。

[48]六艺之中,只有《春秋》不可能使用统编教材,而是各国史官自己记录的《春秋》。但是《春秋》的基本精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却是一致的。

[49]详见吴天明:《春秋〈诗〉义三变》,《长江学术》2008年第1期。

[50]详见《尚书正义》孔颖达《尚书序》,《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影印本。

[51]春秋时代发展了周公《周礼》,案例甚多。例如《左传·文公十八年》记录周公《周礼》最要紧的十六个字,核心是“功以食民”,可见周公及五帝夏商先代圣贤,并不特别在意君子的宗教身份政治身份血缘身份,僭越礼制的情况较少见,所以特别强调论功行赏。春秋君子孔子等则特别要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见春秋君子获取私利时僭越礼制已经成为常态。严防君子僭越礼制,获取不当利益,就是春秋时代新的《周礼》。

[52]吴国公子季札访问鲁国,在欣赏《周乐》时,只要一开头就完全明白鲁国乐工演奏的是什么音乐作品,这说明蛮夷吴国、华夏鲁国乃至天下各国的《乐》都是《周乐》。

[53]《王风》也没有取得“二雅”的政治地位,而与列国之风诗并列。可以据此反推,“周之《春秋》”仅指平王东迁后的东周史书,应该没有西周历史部分,王朝的西周史部分已编入《周书》。

[54]据《左传》记载,楚国乐官钟子期演奏的音乐,与华夏之乐风格不同,故华夏君子称之为“南音”。

[55]详见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点校:《国语·楚语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527-531页。

[56]详见吴天明:《上左下右礼制对中华民族的深远影响》,《理论月刊》2017年第12期。

【责任编辑:邹秋淑】